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何平

(摘要) 本文渐次考察了中国主要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制度特征及其规律,发现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必须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改进,不可能改变其作为货币商品代表的性质。铜钱、纸币和白银主导货币地位的更替演进,在于弥补先行货币形态在特定货币职能上的缺陷,它们之间相互补充。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表明,数字货币的登场,重在特定场景下扩展支付手段、完善货币生态,而非完全替代传统支付工具。

关键词: 货币本质 货币职能 货币形态

JEL 分类号: E40 E42 E50

以2009年比特币的出现为标志,近年在民间兴起了数字货币的热潮,最后推动各国研发央行法定数字货币。那么民间数字货币的出现,是否将通过货币形态的更新,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形式以及经济关系?与人们的生活更为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包括:一是货币形态的选择和使用,纸币、存款货币是否都将退出历史舞台,数字货币成为唯一的货币形态;二是基于“代码即法律”信念的区块链和算法共识的民间数字货币是否将取代央行主导的主权信用货币。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在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对人类货币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本文拟结合中国货币使用的历史实践,来探讨各种货币形态演进的动因和规律,为未来货币形态的选择提供思想资源。具体包括:第一,从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论出发,考察由技术条件决定的、具有特定自然属性的货币形态,由于偏离货币商品的特质,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上的缺失,即货币价值稳定问题。第二,从货币功能论出发,结合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考察各种货币形态在执行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职能上面临的问题,在使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在解决货币的“质”和“量”的矛盾上体现出来的缺失。第三,从货币发行主体和投放方式出发,结合货币价值的担保安排,从政策视角探讨货币形态决定的制度机制和特定货币形态的使用范围,进而提出货币主权治理的历史必然性。

要弄清各种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我们既要考察它们在自然属性上体现出来的执行货币职能的优势和特征,又要考察它们在本质上作为货币商品的替代品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件。只有弄清货币的本质和起源,才能对各种货币形态的演变规律有正确的认识。

一、货币本质与作为货币职能存在的多种货币形态

关于货币的性质,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中内生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

^{*}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批准号:20&ZD064)的阶段性成果。

何平: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从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简单的最不起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即消失”^①。

马克思从交换过程考察货币的产生和性质,“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②。而“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③。由此可见,货币是从交换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的本质属性是商品。

相对于商品世界,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五个职能,亦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货币的职能与商品流通紧密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将“货币”与“商品流通”视为等价范畴。货币的职能隐含在商品流通之中,货币服务于商品流通,如果不是满足商品交易的需要,货币存在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或商品流通中,假定金是货币商品。然而,在历史进程中,实际执行货币职能的具体货币形态,既不是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特定货币商品——金,也不必然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其他形态的货币商品,大多数时候是货币商品的代表和符号。这是由货币执行职能的特定社会条件和过程所决定。

在充当价值尺度时,货币只是观念形态。“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尽管只是用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④。也就是说,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在金、银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论述铸币、价值符号时,马克思指出,“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相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⑤。之所以如此,在于“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⑥。

论及支付手段,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交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111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

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①。

可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货币商品,在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转换为马克思所称的金这种货币商品的替代品,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货币形态。在同一时期,多种货币形态共存互补。而从纵向发展来看,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产生新的需求,而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形态、金属形态向纸币形态演变,近年又朝着电子和数字货币形态演变。各种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在技术、思想与政策的互动中实现。不同货币形态演变的动力在于经济(币材的节约)和效率(价值的稳定)两者重新组合,在技术推动下,各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组合进行重新解读,进而形成政府政策,推出当时社会流通的主导货币。

传统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是以“文”为单位的铜钱、作为它大面额通货的纸制通货,以及不同于计数货币以称量货币使用的白银三种。在简要讨论商品货币之后,下文将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论述各种不同货币形态的更替演进及其制度特征。

二、铜钱流通规律与铜钱职能作用的缺陷

与其他民族和地区一样,中国货币的使用起始于商品货币。商品货币是较之一般商品具有更好的可销售性的商品,属于马克思分析的一般价值形式。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的差别时,指出,“唯一的进步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现在由于社会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②。商品货币作为物质实体的存在,它具有特定用途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货币在流通中,因商品货币的体积、享用主体、可消费性和存续寿命,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超过一定地域和时间,它就不便于流通,并失去价值。

商品货币在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弊端。第一,如果以最有销售性的消费物品充当媒介职能,其供求出现紧张时,就会导致市场上的交换全部瘫痪。饥馑时期谷物的可销售性提高,但是因同一时间没有人出售谷物,市场交易就不可能实现。第二,由于它履行货币职能,会出现超过这种物品需求而期望长期过剩储藏的倾向。过剩保持家畜,影响生产活动。而以谷物为代表的商品货币,因其自身的消费随即退出流通。

在货币职能的执行上,商品货币的缺陷体现为在价值尺度上的不均一,在流通手段上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常常只是特定地区和交易领域特定期间的货币。由于这些缺陷,历史上它大多使用于地域共同体和经济萧条、王朝衰颓时期,受非政治实体的自律机制左右。

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的使用实践,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考古学成果论证的远古中国私有制产生初始出现货币阶段的商品货币和其他时期落后地区的地方性商品货币。卡尔·门格尔专门讨论了“各国及各时代所特有的货币”^③。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初期,似乎大部分民族最有销售力的商品都是家畜。狩猎民族在其与外部交易时以兽皮作为货币。关于远古中国私有制出现之后,历史上最早货币诞生阶段的货币形态,也有猪等家畜充当货币使用的情形^④。这种商品货币通常在基层共同体范围之内流通,具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16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③ 下引门格尔的内容,参见[奥]卡尔·门格尔著,刘黎敖译《国民经济学原理》第八章《货币的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60-182页。

④ 参见尹进《中国钱币起源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第二种情形是金属货币出现之后货币形态的“还童现象”。以魏晋南北朝中古自然经济时期的“谷帛为币”为例。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结果导致了“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的局面^①。这种情形实际上是货币形态演进中的“还童现象”。通常,在王朝覆亡、经济衰退以致政府无力维持现存货币制度之时,民间会自发地创造出货币,在货币形态上复制人类最初的商品货币形态。这种商品货币的复归,是更高阶段货币形态相关制度机制失效的表现。即使在今天,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货币价值稳定上的意义,也部分地体现出人们对主权货币承担的国际货币价值的一种忧虑。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先秦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支持下,中国铸币的历史从青铜铸币开始,春秋战国三大货币布币、刀币和蚁鼻钱的铸造发行,形成多元并存的货币文化。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1911年的帝制时期,中国经历了半两钱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113年)、五铢钱时代(公元前113年-621年)和通宝钱时代(621年-1911年)的三大铜铸币体系的演进。传统中国货币使用的实践体现为铜钱的使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②。下面我们就结合铜钱作为流通手段使用的历史过程,从它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视角分析其职能作用上的特征和缺陷,进而考察政府和民间发行主体的相互博弈及其对铜钱流通的影响。具体地,我们以历史上典型的事件如“周景王铸大钱”、贾谊的“奸钱论”和唐宋“钱荒”,来解读铜钱流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相关的制度机制。

(一) “子母相权论”、价格基准与“一文铜钱”的单一货币流通

秦朝统一中国后的铜钱流通体制,是以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而且流通中只有这种单一货币的流通机制,不存在大小面额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③。在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的过程中,作为价格标准的铜钱,以一个铜钱的累加来计量货币总额。

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通过反对铸造大钱的同时废弃原有小钱的论辩,鲜明地提出了铸币轻重作为价格基准的货币理论。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见于《国语·周语下》的《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文中称“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④。这里明确提出了根据经济形势和民间需求的变化,设定轻重合适的基准货币建议。

《国语》周景王铸大钱,是目前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例子。整个先秦、秦与西汉时期,只有战国时期铸行过具有不同等制关系的钱币。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毋宁说是一种在保持单一货币原则之下以新钱代替旧钱的善后安排,它体现了“轻重论”宏观经济思维路径下,货币在与商品相对比较中体现价值的理念,发展为货币与货币在相对比较中进行替换的策略。秦以后中国铜铸币只是手握一个的铜钱即“一钱”这种单一货币安排,既体现了初始铸币流通情形下人们对货币仅有的朴

① (唐)房玄龄撰《晋书》(全十册)卷26《食货志》,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4-79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④ 这里参考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7-131页。

素认识有益于降低伪造的监管成本,也是顺应小农经济日常交易小面额货币需求的结果。

(二) 西汉贾谊“奸钱论”与铜钱流通规律

铸币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但是在传统中国,官方铸币的不足是经常性的问题,特别是在王朝建立之初经济尚未得到恢复的时期和王朝衰颓时期。这就出现民间私铸货币与官方完好货币的博弈,影响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活跃于西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提出“上收铜勿令布”的主张,禁止民间占有和使用铜料,以杜绝私人铸造铜钱,实现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和统一。他在《铸钱》篇中尖锐地指出了“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货币流通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成为“格雷欣法则”在世界货币史上的最早版本。

贾谊是在货币秩序紊乱、劣币“荚钱”(减重半两钱)充斥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汉初币制始终在“荚钱”范围里兜圈子^①。秦始皇建立的“半两钱”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在秦朝短暂的15年统治时间里已经遭到破坏。西汉面对的是“半两钱”制度败坏后的“荚钱”世界。

贾谊在《铸钱》一文中称,“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②。“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在多种货币并存,没有正常规制保证良币合理足够供给和流通的情况下,出现了“奸钱”排斥“正钱”的现象,人们竞相铸造“奸钱”并及时使用,良币则被收藏,在市面上消失了。良币与劣币的博弈,几乎伴随着中国每一个王朝的始终。

然而,打破王朝界限、从长期看,中国铜钱的最大特征在于其致力于保持在空间上的统一性和时间上的一贯性^③。跨越2000年的铜钱铸造,一枚铜钱保持在1钱(4克)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变化,成色也在始终保持在铜占六到八成的范围。与西欧国家的铸币持续贬值不同^④,各个朝代的政府必须在币材价值高于面额的情况下不断地铸造标准铜钱。之所以如此,在于以前各王朝的铜钱在民间有大量的库存。民间将按新旧铜钱的实际价值差异,对旧有铜钱进行升值,从而出现铜钱挑拣现象。各个朝代发行官方完好铸币、杜绝民间私铸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政策目标,反映了避免将唯一公认的通货低于面额来定价所作出的努力。在南朝最短促的朝代南齐,苦于“圜法久废”和通货不足,建元四年(482年),廷臣孔凯上《铸钱均货议》^⑤,他坚决主张政府要积极铸造“完好”钱币,不得“惜铜爱工”。孔凯是在正确认识格雷欣定律基础上提出的铸币主张,正确地反映了铜钱流通规律。

作为实体货币的铜钱,是从一方手中转到另一方手中的手交(hand-to-hand)货币。它具有存款货币所没有的两个特征:第一,在货币实体本身存在价值的情况下,难以与铜的币材价值的变动独立开来履行媒介职能。第二,具有实体的手交货币,发行分散出去之后未必回笼,也就是难以保证货币完全回笼。铜钱之类手交货币不回流,是由于两个原因。(1)越是处于上位的市场,对零细面额通货的需求越低。零细面额货币集中及搬运费用,比高面额货币要高。需求很小而耗费成本使得零细面额货币上行的动机不足。(2)季节性强、振幅大的市场具有储备更多手交货币的倾向。货币流通速度,不如看成滞留难度。小面额货币大量发行,农村市场充分发达,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社会,通货就有滞留在底层市场的条件^⑥。

① 参见钱剑夫著《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2页。

② 贾谊《新书》,见[汉]贾谊著,彭昊、赵勳校点《贾谊集 贾太傅新书》第53-54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③ 参见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④ 参见[美]莱因哈特、罗格夫著,慕相等译《这次不一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141页。

⑤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37《列传第十八·刘俊传》,第2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2页。

⑥ [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何平: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在铜钱不足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或行业便设定了不同自律框架予以应对^①。一方面,在铜钱一枚一枚的使用上,出现铜钱挑拣和不同价值铜钱比例使用的设定。如在1480年的北京市场上,“近日以来,买卖人等……将洪武、永乐等钱,往往挑拣不用,抑或加数折算”^②。中国各个王朝铜钱的使用历史,自始至终就是在民间铜钱使用不断进行双重化的倾向和致力于整齐划一的政策之间博弈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大面额的表示方式上创造出“短陌”,不足百钱当百钱使用,各个地方或者行业设定不同的比例框架^③。这是将劣币铜钱当成基准货币对完好铜钱的成比例地升值使用,也是一种弥补完好铜钱短缺的创制。

(三) 唐宋钱荒及货币形态的革新

在传统中国的唐宋时代,由于商品交易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和财政货币化程度加深出现了具有现代货币政策意义的“钱荒”现象^④。铜钱紧缩对于生产的直接影响是产出的萎缩和经济的萧条。

历史事实和唐宋时人的钱荒论表明,钱荒的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来分析。在需求方面,主要体现为两个原因。第一,财政货币化,也就是税收以铜钱来征收,无论在唐代或是宋代,都是钱荒的第一位原因,问题意识的契机主要体现在唐代780年的“两税法”和北宋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并充分体现在唐宋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上^⑤。货币形式的税收大幅度增加,比如元丰年间的最高岁入钱数在6000万贯以上。需求侧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模式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上,官方和民间货币使用量必然增加。同时,自唐代中期开始,经济交易的模式从秦汉官方垄断模式的大商人盐铁交易,转化为以茶米为主的平民化交易,铜钱的使用主体大幅扩大,市场形态从城镇坊市向草市镇转型,普通小民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使唐宋面临一个铜钱短缺的经济环境^⑥。

在铜钱的供给侧面,体现在绝对供给量(铜钱铸造的减少)和相对供给量(铜钱的退出流通和流出国外)两个方面。唐代铸钱的减少明显,而北宋铜钱铸造自咸平3年125万贯,上升到熙宁末年(1077)的373万贯,元丰年间(1080)的最高点506万贯^⑦。流通中官铸铜钱的减少由以下因素促成:(1)蓄积铜钱,大量铜钱作为财富形态退出流通。这是在没有近代银行体系的唐宋时代,富豪私自蓄积铜钱形成的“货币的沉淀”现象^⑧;(2)销毁铜钱作为器皿、佛像以及其他用途,直接导致铜钱的非货币化。唐末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铸钱,表明两者矛盾冲突的极端化;(3)铜钱的外流。面临国际化环境的宋代,铜钱的外流表现为张方平所描述的“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⑨。唐宋财政行政和经济交易模式转换的全新局面,加上前述铜钱不还流的特征,使得唐宋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铜钱紧缩状态。

铜钱铸币这种货币形态较之商品货币,在价值尺度上的同质性、流通手段上的方便性(体积小、易于分割)和贮藏手段上的持久性(不腐烂)均得到了改进。然而,在其自然形态上,铜钱货币

① [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5页。

② 《挑拣并伪造铜钱枷号例》。见(明)戴金编纂《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第6册,乙编)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参见何平和林琳(2013):《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④ 关于钱荒的全面分析,参见何平《中国历史上的钱荒》,《中国金融》2016年第8期《唐宋的“钱荒论”及其实质》,《中国钱币》2019年第6期。

⑤ 参见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见所著《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1975年版,第234页。

⑥ 高聪明《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文就货币使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49页。

⑦ 高聪明《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文就货币使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

⑧ 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37页。

⑨ 张方平著,郑涵点校《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形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铜钱短缺,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实体货币都存在数量上的有限性。在交易模式和经济发展发生飞跃的唐代中期,铜钱短缺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重要矛盾。第二,劣币的充斥,私铸的泛滥,不利于铜钱执行价值尺度职能,造成交易的不畅或者自律的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发展。劣币的泛滥,源于铜钱铸造在技术上官方未能获得独占优势,同时,在官方铸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体系不足以杜绝民间因逐利进行的私铸活动。铜钱形态第三个显著的缺陷是以一枚一枚铜钱计数使用的流通原则,导致它只适于服务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领域,不适于远距离和大额交易的使用。

既然官方铸币治理无效,民间创造出的“选钱”和“短陌”自律机制只适用于民间地域流动性需要,在铜钱范畴内来寻求弥补短缺的办法就走到了尽头。铜钱货币形态的这些缺陷,在唐代中期交易模式和市场发展形成的需求驱动下,促成了货币形态的创新。首先是在唐代宪宗年间,为解决南方购茶不得带出京师铜钱,创造出汇票“飞钱”^①。唐宋表现为官铸铜钱短缺的“钱荒”,借助北宋时期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终于创造出新的货币形态——“交子”纸币。

三、北宋“交子”产生的动力与纸币价值危机

体现为“钱荒”的铜钱短缺直接促成北宋年间四川交子的诞生。在克服铜钱供给的短缺之外,纸币凭借其自然形态的特征,凸显了它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优势。同时,由于它本身仅仅是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需要相应的制度机制来补充。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纸制货币的性质、机理和制度内涵^②。

(一) 四川交子产生的动因与“杨冠卿之解”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即“交子”,产生于北宋四川铁钱区。北宋初年由于铜钱的短缺,四川形成独具特色的铁钱专用货币区。关于交子的出现,史称,“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③。关于十六家富民主持交子发行与流通的具体情况,李攸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描述:“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④。

李攸的记述,详细透露了民间交子“交子户(铺)”时期交子的运行机制。第一,在发行主体的性质和资格上,由益州有实力的“豪民”十余户联保负责,交子户对官府承担人力和物力的义务,以取得发行交子的特许权。第二,交子的发行方式、发行数量与发行准备。交子户根据民间经济主体提出的实际需求,“书放”交子,“动及万百贯”。交子以“收入人户见钱”来发行,属于铁钱代用品。第三,交子的面额式样、期限和使用范围。交子式样相同,没有固定的面额,根据缴纳的铁钱数量,“书填贯不限多少”。同时,交子也无特定的流通期限。交子的使用限定在益州地区交子户客户活动范围的特定流通领域。

“交子”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这种货币给人们带来方便(方便携带)、安全(减少偷窃)和成本的节约,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供给的不足。实际上,交子是唐

①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1388-1389页。

② 关于传统中国纸币的全面论述,请参考何平著《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第三章,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③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癸卯”条,第4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42页。

④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全3册)卷15《财用》,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何平: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宋经济结构(茶叶消费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交易模式的变化所催生,它与茶商、四川铁钱区形成的特定地域下由共同信念支撑的共同体信用直接关联。

关于铁钱区最早产生纸币的缘由,南宋人杨冠卿(1138-?)的解释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关于纸币诞生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论述。在南宋初年的人看来,似乎纸币只适宜四川地区使用,给人一种神秘感。杨冠卿称,“人皆曰蜀之铁与此之铜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盐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其所藏而不肯轻用耳”^①。这从铁钱和纸币均缺乏贮藏价值,作为流通手段具有相似性,论证了纸币的可接受性。正因为如此,纸币流通就需要合理收放的数量调控安排。此后中国纸币使用的成效,就取决于纸币价值维持机制的有无和效率的高低。

(二) 南宋的“称提”实践与纸币流通规律

“交子”民间纸币时代由于铁钱兑换的信用丧失,1023年便迈入官交子时代,从此中国纸币在官府主导下发行和流通,经历了北宋、南宋、金、元、明时期,以及清朝咸丰年间的短期发行。纸币产生于金属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具有特殊的流通规律。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信用扫地的风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②。对于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要其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在于数量的调节。

人类迄今为止形成的最主要的纸币价值管理经验包括:一是从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着眼来稳定其价值,保证纸币的兑现;二是维持纸币与商品的合理关系以稳定其价值,保证纸币的购买力。南宋纸币管理的“称提理论”及其实践,是人类史上利用系统政策措施进行纸币管理的最早实验。所谓称提理论,是南宋会子价值调控政策和措施的指导思想。“称提”,亦即平衡,“指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引申出权衡不同物品的比例、对应关系,使之符合于某种原则和规定的做法”^③。其核心是调控纸币流通的数量。

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1127-1194)在我国古代纸币价值风险管理上,地位突出。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上,曾称“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④。他积极地提出了管理纸币价值的基本原则,“少则重,多则轻”,纸币价值的稳定重在控制纸币的数量。自13世纪起,宁宗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由于财政支拙和开禧北伐,造成会子三界并行,大量增发而不断贬值,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南宋政权的存亡。从此时起以迄南宋末年,人们用“称提”理论来处理纸币价值的稳定问题。

南宋两次大规模的会子“称提之政”,一次实施于宋宁宗嘉定年间,另一次实施于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间^⑤。从政策工具的使用看,今天人所共知的货币政策中的一般性政策工具、选择性政策工具、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在南宋都有原初母本。(1)一般性地、全局提高纸币价值的会子紧缩措施。这既包括以货币与财政政策回收纸币减少流通中会子数量的紧缩性措施,也包括增加铜钱数量及以“钱会中半”保证收税中会子使用比例的政策措置。同时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倍数收缩会子的发行数量。(2)有所选择地、局部提高会子价值的措施。这是将政策适用的对象指向特定

① [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9-50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0页。

③ 叶檀《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并参考叶世昌《说“称提”》,《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④ (宋)戴埴《鼠璞》“楮币源流”条。见《全宋笔记》第八编(四),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6页。

⑤ 南宋称提会子的详细内容,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2-700页。

的阶层和特定的经济领域,突出的事例是计亩征收会子和盐钞品搭会子。(3)以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嘉定年间,强制人们按照会子的面额进行会子与铜钱之间的兑换和计价,并辅之以严刑峻法。(4)“阴助称提”。关于会子的发行保证问题,马端临称,“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以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①。这是政府以价值1千万贯的专卖物资,作为会子发行的二级准备,对铜钱现钱的准备不足,起到辅助准备的作用。此外,南宋政府通过出售专卖物资、黄金、官诰、度牒以及专卖凭证等证券资产来回收纸币。

迫于国用边防军事费用的压力和造币以立国,传统中国最具成效的纸币管理实践南宋政府对会子的称提之术,终于归于失效。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其“无用之用”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构。此后中国历史上的纸制货币使用成效的好坏,均依赖于其镶嵌所在的制度建构。

(三) 传统中国纸币的性质及其命运

较之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纸币的自然形态突破了它们在数量上的有限性,以及作为流通手段携带和适于大额交易的便利性。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职能的缺陷。它本身没有价值,其作为货币的条件在于相关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以保证适度的数量供给。自从北宋四川地区(当时的益州)“交子”产生之后,历经北宋的地区性官方交子纸币时代、南宋的会子及地方性纸币(淮交、湖会和川引)、金的纸钞和元代的全国性统一纸币和明朝的大明宝钞时代,古代货币经历了到目前为止所有性质的纸币形态转换。各个时期的纸币流通都没有摆脱“30年宿命”,也就是在30年以内都从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纸币转化为国家纸币。

传统中国纸制货币的历史表明:第一,纸币要成为信用货币,只有在类似益州民间交子的社区共同体信用机制中才能成立。社区信用货币的纸币风险,以发行者的信用缺失,进而纸币被淘汰为终结。第二,关于北宋“官交子”的四川货币特区,南宋会子的“钱会中半”体制及交子价值稳定的“称提之法”,金、元纸币实验表明:它们在初期都注意了准备及保证问题,但很快就因纸币发行技术上的便利性,将其价值保证机制忘却脑后,从信用货币转化为国家纸币。使用人为控制数量的纸币形态,突破了铜钱自然约束的局限,为经济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货币。然而,这种货币形态上的优势和便利由于制度的缺失,否定了它作为货币代用品的可能。这典型地表现在明代朱元璋“大明宝钞”制度所进行的、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中,作为“无准备、无数量、无兑换”制度安排的指令型纸币,是一种随心所欲、超脱了由经济原理保证的货币价值基本原则的狂妄政策,仅仅11年便贬值到原来的20%,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等待近代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纸制货币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得以彰显。

四、“白银时代”多元复合的货币形态与信用货币的缺失

与西方在金银流通基础上使用的纸币不同,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恰恰是在应对铜钱和纸币存在的缺陷中得以实现。

伴随明代嘉靖以后的赋役制度改革,以万历六年(1578)《万历会计录》的编撰为标志,白银取得了主导货币地位,中国进入“白银时代”。然而,白银货币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像今天“一国一通货”条件下的货币制度,在货币形式上实现一元化的形态,而是白银、铜钱和民间私人纸币并存互补的流通格局。白银作为货币所展示出来的功能,对于不同社会经济主体(不同阶层)、不同市场领域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在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上,明显地体现为作为财政税收手段的白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掠夺基层百姓,实现财富集中,导致市场流通手段短缺,引发社会失序以致王朝更替。

^①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册,第246页。

何平: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

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这一货币本质上,白银货币的使用呈现出典型的不完整性。白银尽管为明清时期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但其使用在行为主体和市场-经济领域上均有局限性。明清时期的货币流通,主要地体现为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上存在着多元并存的货币形态,它们的职能边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依历史情势和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由于当时的主导货币白银主要由海外供给,中国500年“白银时代”(1436-1935)呈现“有货币,无制度”的局面。

关于明清白银货币的流通^①,称量白银在明代取代官钞,成为主导货币。从历史维度上看,白银承担了大额支付职能。在民间基层市场的小额交易中,铜钱的身影从未消失,“银钱兼行”构成铜钱使用和白银使用的两个世界。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以及铜钱和白银本身的天然缺陷,最终滋生出民间创出的明末“会票”和清代虚银以及票号等机构划转的使用方式。实际上,“白银时代”的货币形态——主导型货币白银、生活日常的铜钱,以及民间私人纸币,三者为互补、并存关系。三者在使用主体和地域上形成互补,各种货币的功能既按市场层次形成区隔,也形成地域性的自律机制。地方性市场圈的货币使用机制起到了稳定地方市场的作用,而白银除了服务于跨地域流通之外,更多地服务于政府的财政军事目标。

“白银时代”的白银流通以称量白银的形态进行。就明清没有发行白银铸币之谜而言,选择称量白银货币形态,实际上是将货币的供给寄托于自然力量,承认官方铜钱铸币政策和纸币政策的失败。而且,由于官方资本(白银)和民间资本(铜钱)的蓄积使用不同的货币手段,在“上下不通”的货币结构下,明清政府没有铸造通行全国和不同市场的白银铸币的必要。

白银主导的货币制度的缺陷,在与西方同时期货币制度建设的比较中凸显出来。主要体现在本位制度及相应的信用货币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的滞缓和缺失。生活于明代中叶的邱濬(1419-1495)提出了“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使用的货币层次结构论。在“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的认识基础上,邱濬在《铜楮之币》提出了“以银与钞相权而行”,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建立白银、纸钞和铜钱三个层次的货币体系,让其交易价值比率确定,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分轨流通^②。15世纪末,以西班牙为首进行了“本位方案”的尝试^③。本位制的基本理念是,“大额硬币是计价单位”,而“辅币价值用大额硬币来表示”,其要义在于建立主辅币体系,实现基准货币的价值稳定和名目小额货币对市场需求灵活应对,进而形成全国一体化的货币体制。“邱濬方案”以比价关系来划分三种货币的流通轨道和功能区分,多种货币并存互补流通,与“本位方案”决然不同,不利于货币和市场的统一。

在信用货币建立方面,白银时代有会票之类民间私人纸币的建设,但那只是灵活应对地域和行业货币需求的努力。清初陆世仪(1611-1672)在讨论白银、铜钱和纸币的组合使用时,从纸币服务于大额和远距离交易的优点,讨论了以信用票据形式实现纸币稳定流通的条件。他称,“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④。这种“会票”相当于今天的汇票,是异地取钱的凭证。

在陆世仪生活的时代,西欧特别是英法等国已经开始以银行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形态的实践。

① [日]黑田明伸《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明]邱濬撰、金良年整理、朱维铮审阅《大学衍义补》(上册)卷27《铜楮之币下》(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③ 参见[美]托马斯·J.萨金特、弗朗索瓦·R.威尔德著,沈国华译《小零钱大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7页。

④ 陆世仪《论钱币》。见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四)卷52《户政》(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5-1876页。

马克思指出,“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交易的领域中去”^①。与此比较,明清时期民间的“会票”,区别于以商业信用为基础、银行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形成的信用货币。陆世仪主张发行的“银券”(银汇票,“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只是解决大额、远距离交易的不便,不能解决流通中白银不足的问题。

金银本位制下的金银贵金属货币制度,本身就隐含着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的配合,而银行券这种纸质货币形态成为信用货币的重要形式。西方借此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国一通货”统一纸币发行,实现了对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而中国在明清时期,却未曾建立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尽管踏入了“白银时代”,却没有建立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货币制度。中国称量白银货币的使用,是在铜钱和纸币两种货币形态的缺陷凸显之后的一个弥补办法,而这个弥补方式的取向与西方分流,陷入落后境地,其缘由在于货币形态变革后相应的制度建构的缺失。

五、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与货币形态的未来

以上我们通过铜钱、纸币和白银使用的历史实践,论述了不同货币形态演进的动因和相应的制度机制。清初士人陆世仪从货币形态的自然特性出发,精辟地论述了货币形态更新演进的过程和动因。他称:

“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则于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有所以通金与钱之所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②。

陆世仪论述了从实物形态“粟与械器”的商品货币,到黄金、铜钱形式的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各种货币形态的相互扩展、更新的过程。金的出现是克服“粟与械器”这种商品货币在价值尺度上不均一、不便量算、在流通手段上不便携带的缺陷。体大价低的商品货币便不如体小贵重的金。而金不适于小额日常交易,铜钱便应运而生。而在远距离流通方面,金和铜钱都不便于携带,便催生出纸币,重的金、钱就不如轻的纸币。从货币本身的自然形态所体现出的特质来看,每一种新型货币形态的登场,都是弥补现存货币形态在某个方面的缺陷,在变动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技术支持下创制出来。作为满足不同条件的货币职能存在,通常是新旧货币形态并存互补流通。就上述中国货币历史演进所做的分析,综合起来,货币形态的演进体现出以下重要的规律和原则。

第一,每一种货币形态的演进均与政府财政活动相关联。换言之,一个时期社会整体主导货币的选择,由当时政府的财政行为决定。我国最早钱币文献“周景王铸大钱”,说明国家统一铸币是财政分配活动的工具。铜钱主导货币的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时代均是当时王朝政府统一财政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超越政府的货币形态在历史上只是基于自律行为的地域货币,不可能成为全国性货币。在近代央行主导的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形态的选择和使用,更是与政府政策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② 陆世仪《论钱币》。见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四)卷52《户政》,(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5页。

切配合的货币政策的重要一环。

第二,铜钱(白银)、纸币与商品货币不同,它们只是货币的职能存在,本身不是货币商品。这种作为货币商品替身的铜钱和纸币,在发挥货币职能时,必须遵循货币商品在商品交换中的基本原则。铜钱在职能作用上的缺陷,必须以新的货币形式和相应的制度机制来弥补。本身无价值的纸币的职能作用和流通,体现着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其价值的稳定,数量的控制,必须由相关制度机制来维持。在传统中国,由于专制集权的政治特征,每一个王朝的纸币总是陷入无限制的发行,结果失去货币的职能作用。同样是纸作的货币,银行券和中央银行不兑现信用货币却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得益于基于契约精神的制度约束和宪法主导的法律机制。铜钱、纸币这些货币商品的替代品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货币商品,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多大程度上来保证它完备地执行货币商品本来要完成的职能。

从与货币商品自身的关系来看,越是到更高级的阶段,货币形态的演进、货币职能的外化拓展越是偏离货币商品本身。货币形态演进中消解掉的价值要素、职能偏重和担保品的外在化,都需要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维系。与蕴含着技术因素的货币形态关联的制度要素,主要体现在市场的发展和交易模式(社会构成)、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与自律(地域信用)、政府的行政财政。这些制度要素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货币、市场状态、相关制度规定最终推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特色,塑造出不同的货币制度。然而,任何时候货币都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本身,它是人类获得特定使用价值或服务的手段。所以,脱离了实体经济活动、商品或服务这种货币服务的对象,货币就不再成为货币。单纯货币形态在技术上的提升不可能改变它作为货币商品替代品的性质。不存在一种脱离商品世界、价值不变的货币形态。

第三,每一种新型货币形态都是新的社会条件所提出的新需求下创造出来的,用来承担某一项特定的货币职能。铜钱在于满足小农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的交易需求,在零星交易中充当流通手段。纸币在于克服实体货币金属货币供给的不足,充分展示它在流通手段供给和远距离流通上的优势。白银在于满足大额需要和价值贮藏,充当价值贮藏和价值尺度的功能。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发挥三种货币职能上的偏重及所伴随的缺陷,必然由其他货币形态来补充。现代物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渗透进货币活动的领域,作用于支付领域,进而形成新的货币形态。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货币形态服务于不同的生活场景和经济领域。

关于近来区块链主导的数字货币热潮,我们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认识^①。加密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因在于消除管理货币时代央行货币过度投放带来的潜在通货膨胀,利用算法解决货币数量的固定和支付便捷的问题。比特币的固定数额目标,黄金货币的天然限制早就具备这个条件,问题在于经济活动的变动不居。货币的运动体现出自由分散的特质,货币的供给和物价控制本身就是把握可能性的艺术,试图用一个技术上的设定来解决充满活力的人的行为左右的货币供求,存在着必然的逻辑矛盾,没有现实可能性。数字货币至多是货币商品的替代品的一种,不可能脱离商品世界而独立存在,而私人数字货币在货币的主权国家治理时代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商品的替代品。以“算法共识”构建的民间数字货币可以作为企业自身运作的工具,而不可能获得社会公认,因为现代货币是由国家法律确定,并以主权国家来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为前提。数字货币更不可能仅仅凭借它的自然形态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因为这涉及现行的社会组织形式、法律与制度。

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去主权国家化,实际上是以新的中心替代现有的社会建制,将失去商品供给的组织者和货币价值的可靠担保者,既不符合主权国家治理的法律和制度,也不符合国际经济交往的制度安排,更是对中央银行制度长期货币发行经验的漠视。数字货币的所谓匿名性只是针

^① 参见何平《私人数字货币的限度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对电子货币使用情景的技术改进,并未显示出对纸币和存款货币制度的超越。数字货币在替代纸币上的成本节约,是一个没有实证的推测,实际上,数字货币运行的基础设施、终端设备和系统运行的耗费,绝不是纸张和印刷成本可以比拟的。

数字货币的优势体现在支付手段职能的发挥上。正是基于此点和货币使用的历史经验,在适应技术进步和民众需求的情形下,各国酝酿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是特定技术支撑的货币形态,它需要特定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环境,并对使用主体有能力方面的要求。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为了取代现金和存款货币,而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手段,形成新的货币生态系统,满足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看到的将是纸币、存款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并存互补的局面。它既不会成为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商品,也不可能是未来始终存在的唯一货币形态。

参考文献

- [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纪念版),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 [美]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 [美]托马斯·J.萨金特、弗朗索瓦·R.威尔德《小零钱大问题(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日]黑田明伸(2020):《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高聪明(2001):《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
- 高聪明(2001):《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
- 何平(2016):《中国历史上的钱荒》,《中国金融》第8期。
- 何平(2019):《私人数字货币的限度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探索与争鸣》第11期。
- 何平(2019):《唐宋的“钱荒论”及其实质》,《中国钱币》第6期。
- 何平、林琳(2013):《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何平(2019):《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
- 钱剑夫(1986):《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 全汉昇(1973):《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载所著《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
- 汪圣铎(2016):《两宋货币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世昌(1996):《说“称提”》,《中国钱币》第1期。
- 叶檀(1990):《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尹进(1988):《中国钱币起源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
- (春秋)左丘明撰 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
- (汉)贾谊著 彭昊、赵勳校点《贾谊集 贾太傅新书》,岳麓书社2010年版。
-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二),中华书局1972年版。
- (唐)房玄龄撰《晋书》(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
- (宋)戴埴《鼠璞》“楮币源流”条,载《全宋笔记》第八编(四),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 (宋)张方平著 郝涵点校《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
-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全3册)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 (宋)杨冠卿撰《客亭类稿》,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3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
- (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册。
- (明)戴金编纂《皇明条法事类纂》,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第6册,乙编) 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明)邱濬撰、金良年整理、朱维铮审阅《大学衍义补》(上册)(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 (清)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四)(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责任编辑:周莉萍)

CONTENTS

mercantile credit mechanisms are insufficient , and payment defaults have become a long-standing problem and an acute bottleneck in the reproduction microcirculation of micro ,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tivate the mercantile credit mechanism and break the blockage of microcirculation , we need to make improvements in six aspects: changing mindset;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using the activation of commercial acceptance bills as a breakthrough; establishing a trading market of commercial acceptance bill; upgrading financial statistics;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Key Words: Domestic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ommercial Credit; Commercial Acceptance Draft

JEL Classification: E51; F65; O11

China's Experience and Future Trend of Currency Form Evolution

HE Ping

(School of Finance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 100872 ,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ws of evolution of different money forms in Chinese history. It believes that the elements of value , the emphasis on functions ,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llateral eliminated in the evolution of monetary form must adapt to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change of currency forms with technical progress cannot change the essence of mone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ommodity. Each new form of currency is born under a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ith technical support. China's experi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money forms shows that the debut of 'digital currency' mainly serves as 'means of payment' under certain occasion. 'Digital currency' will improve the monetary ecology and enrich the existent forms of money , rather than completely replace them.

Key Words: Nature of Money; Function of Money; Form of Money

JEL Classification: E40; E42; E50

Return on Capital ,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 Debate with Data

LI Ch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 100836 , China)

Abstract: As the central claim in his chef d'œuvre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Professor Thomas Piketty argues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denoted by r)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g) constitutes the 'main